

禪堂

談禪史與禪法的分別

許志明

前面的話

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內，看到一本「春秋」雜誌，這本雜誌是名政論家丁中江先生及名專欄作家阮文達先生、丁燕石先生三人創辦的。在台灣的雜誌界，具有相當高的水準，也佔有相當高的地位。

其第十六期上有朱濟先生撰的一篇「談一貫道的虛虛實實」的文章。好奇心驅使，讀了一遍。讀該文之先，本只打算瞭解一下「一貫道的虛虛實實」，因為我沒有讀到過有關一貫道的文字，只聽說「一貫道」目前發展迅速。由原來的地下傳教，而至今日公開活動，並在如此大雜誌上報導，故有一讀該文的衝動。

看過該文以後，覺得文中所說：「……由居士繼承了禪宗這一派的道統，這也就是今日一貫道一脈相傳的道統，這個道統既傳給居士，照一貫道人士的說法，這就叫做：『釋終儒起』。」這與所知禪宗史的記載不同，這種說法不無混淆視聽之感；且朱先生文中強調「一貫道」將以「攤位眾多的百貨公司，壓倒（佛家）專賣店……」，「使傳統的佛教廟宇無人進去。」這些的論說，對佛教不無貶損之處。

我既然是個受了菩薩戒的佛弟子，當佛教被如此不合史實的貶損，豈有視而不見之理，故也寫了一篇「談禪宗的『道統』繼承」一文試投「春秋」雜誌，以為說明禪宗血脈傳承的歷史事實，同時也用二千年來，佛教在中國會遭遇過數次的教難，佛教寺廟仍然「有人進去」，「一貫道」是否有足夠的力量使佛教寺廟門堪羅雀，歷史可以信任。因為佛教是經得起考驗的正信宗教。

「春秋」雜誌收到拙文後，其編者先生即影印一份交朱濟先生閱覽，朱先生看過拙文後，又寫了「再談一貫

道的虛虛實實」一文，與拙文一同在「春秋」十八期刊出。朱先生因不能用史料來作爲論證，對拙文所提出的歷史證據無法推翻。他一方面採取對歷史證據的懷疑態度，而同時又用禪法上的「無念、無住、無相」來否定歷史證據。用這種方法來討論問題，是不堪識者一駁的。

所以，我又寫了「談禪史與禪法的分別」一文送「春秋」。「春秋」雜誌收到拙文之後，創辦人之丁燕石先生來了一封限時信，很慷慨地要長期贈送「春秋」一份給我，而且對我讚譽備至，讀了丁先生信以後，心內既感激又溫暖，可是「春秋」十九期並未將拙文登出。

「春秋」二十期寄來後，上面又無拙文，但有名作家「高陽」先生寫的一篇「剖析一貫道的脈絡」大作，「高陽」先生是清史學家，他依據清代史料，說明清代是如何派兵圍剿「一貫道」，認爲「一貫道」至「光緒年間演變爲義和拳。……」他用清史來否定朱濟先生的一切說法。

「春秋」的編輯先生可能也將「高陽」先生大作影印給朱濟先生看了，朱先生又以同樣的方法，寫了一篇「先理脈絡再作解剖」的文章，與「高陽」先生文章同期刊出。

「春秋」二十一期收到後，拙文又沒刊出，却有「一貫道」的「作家」蘇鳴東先生寫的一篇「一貫道中人談一貫道」，蘇先生在文中對我刊在「春秋」十八期「談禪宗的『道統』繼承」一文，大加撻伐，並語多粗話。於是，我又根據史料寫了一篇「『道』、『統』不可扭曲」的文章，送「春秋」以爲辯正。

「春秋」二十二期收到了，上面也沒有拙文的刊出，我覺得該二文可能不採用了，所以寫了一封信給丁燕石先生，如「春秋」不再刊出拙文，則請擲回以留紀念。丁先生接到我的信以後，立刻回了一封信。大意是說：「本刊編委會在討論編輯內容時，以一貫道問題已連續討論多期，甚多讀者亦投函以爲應暫停討論。故決定將此問題暫予擱置……」等語，並將我寫的二稿退了回來。

接到退稿以後，原已「束之高閣」，但過了幾天，又想到這二篇文章是爲護法而寫，也是爲真理而寫，若不刊出，豈不是護法不力，真理也不明了嗎？幾經考慮，認爲該二文仍有另投的必要。

國內的報章很少報導「一貫道」的消息，其他雜誌有沒有如「春秋」一樣討論過「一貫道」，因我不大喜歡看市面雜誌，故所知有限，不敢貿然投稿。於是，想起我是「內明」長期作者，「內明」或者會接受，經先函沈九成居士要求，經徵得其同意，願在四象堂刊出，內心既高興又感激。

因恐「內明」讀者們不明瞭事情原委、經過，特將此二文之因緣予以說明，請「內明」讀者大德們多多指教。

看了「春秋」十六期朱濟先生的大作「一貫道的虛虛實實」一脈的道統。「覺得有點與史實不符，故寫了「談禪宗的『道統』繼承」一文，試投「春秋」。春秋編者先生乃影印一份送與朱

濟先生，朱先生看了拙文，乃又寫「再談一貫道的虛虛實實」，與拙文同刊在「春秋」十八期。

朱先生在「再談……」文中說：「從其大文（指拙前文）中更證明許先生是認真讀書的讀書人。」我看了這句話，真是自覺慚赧不已，我不但不是「認真讀書的讀書人」，甚至也不是「讀書人」，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為五斗米而折腰的人。陶潛不為五斗米折腰，解印綬而去，安貧樂道，詩酒自娛。我却沒有他那份灑脫，每日得兢兢業業，折腰不已。這，已足證明我不是「認真讀書的讀書人」。只是在公餘之暇，看看書而已。朱先生在「春秋」的第一篇大作，就是在公家訂的「春秋」上看到的（現在不訂了，心內悵悵然）。所以，這句過譽之詞，實不敢當，但蒙錯愛，衷心謝謝。

爲了與朱先生再一次討論（非辯論，請勿誤會）有關禪史與禪法的分別，同時也討論有關史料的處理問題，所以冒昧地再寫此文，我想：應該也是件很有意義的事，但願編者先生不要投之垃圾桶。

禪宗的研究方法

研究禪宗的人很多，其研究的方法，大別可以分爲二途，一是研究禪史；二是研究禪法（學）。我前文的標題是「談禪宗的『道統』繼承」，由這個題目，不難瞭解是屬於研究禪史的範疇。因其在研究禪史，所以對禪法的中心思想問題不談。

既然不談禪法的中心思想問題，爲什麼又用「道統」一詞呢？那是由朱先生大作中「移植」而來，這是爲了使讀者有一個統一的概念。因爲「春秋」的讀者不都是懂得禪的人，如朱先生用「道統」，本人却用「法統」、「法脈」、「血脈」等禪宗慣用的歷史名詞，就會使讀者產生迷惑之感。

朱先生在「再」文中，用禪宗的無念、無相、無住等來否定禪史，認爲執着於禪史的史料而不談禪「道」即是「縛」，這在

方法上，就有點出入了。

談史須執著史料

談史必須執著史料，以爲立論的基礎，這是任何研究史學的人所肯定的方法。除了執着現存的史料以外，還得到處蒐集史料。地面上的史料蒐集不足以說明歷史的時候，就到地面下去找。所以才有考古之學的產生。

若談歷史而揚棄史料爲依憑，而用傳說、臆測、想像、理論來寫，那末，所寫出的歷史，無論作者梳理得如何有條不紊，那也只能作爲野史、小說看，沒有歷史價值，譬如「西遊記」，寫得那麼生動、活潑，可讀性那麼高，但它終不能取代「大唐西域記」的歷史地位。「大唐西域記」的文字是那麼艱澀，但它在中國佛教史甚至中國史上，却有着不可替代、不可漠視的歷史價值。如果要研究玄奘大師前往印度取經的歷史，不執着於「大唐西域記」，而用玄奘大師所譯的「大乘唯識論」去研究，那就文不對題了。因爲「大乘唯識論」是思想問題。所以，朱先生說：「這樣，我們就用不着循漸悟、依頓悟去作抽象思想中的思……只須憑藉我們對歷史的知識，就可以來討論有關禪宗道統的繼承問題了。」這，一點也不錯，研究「禪宗道統繼承問題」，是屬禪史問題，要「憑藉歷史知識」，依據禪宗史料處理。是不能用「抽象思想中的思」作禪史處理的基礎的。因爲禪宗「抽象思想中的思」是不可以形諸文字的，它只是一個「空」的「佛性」。要達到這「空」的「佛性」，方法却有八萬四千。方法則可以作爲史料，如拙前文引用北宗神秀的「凝心入定，住心看淨，起心外照，攝心內證。」這是漸修法，這漸修法由其弟子普寂「繼承」了下來。而南宗神會却用「單刀直入，直了見性，不言階漸。」這是頓悟法，這由達摩一直傳至六祖而由神會「繼承」下來，都可作史料處理。

一貫道如果肯定自己「繼承」了「禪宗這一脈的道統」，當然要從史料方面的法（經）、衣、鉢及教法上下功夫，去尋自己

的「根」，就如同一般人憑藉族譜或父母遺下的信物去追認血親關係一樣，這是不能錯亂的。

中國是一個崇尚儒家宗祧倫理觀念的民族，禪宗中國化後，完全吸取了儒家宗祧倫理觀念。在這方面，他們是很認真的，只要對禪宗畧有研究的人，都會發現這一點。

禪法的中心思想與禪史是對立的，雖然如此，在禪籍中，禪史與禪法却同時存在着。如「六祖壇經」的「行由品」就是禪史部份，其他論禪（法）的各品中，仍夾雜了史料。所以，談禪史只能取其史料來談，不能取禪法來談。如果用禪法的無念、無相、無住來談，不但禪史要捨，即是任何事物都得捨，捨得乾乾淨淨，才能見到佛性。如此一來，禪史就不存在了，還能談個甚麼？

胡適與鈴木大拙的立場有異

拙在前文中引用了胡適先生的一段史料做參考。朱先生認為：「胡適的考證，當然是值得我們信賴的，但日本禪學權威鈴木大拙，又指出胡適一大堆錯誤，我們究竟該信誰呢？」這就是對待禪史與禪法的認知問題了。

鈴木大拙先生因其是「禪學權威」，所以他有豐富的禪學知識和濃厚的宗教情感，他對禪史的看法，重在思想的連貫。而胡適先生，無宗教信仰，不受宗教感情的約束，他只是一位史學家，所以他對禪史的看法，重在史料的考證和考證。由這，我們就可以決定我們選擇「信」的目標了。如果想了解禪學，應重鈴木大拙，如果想了解禪史，則應重胡適，這方法應不太困難。

因鈴木大拙與胡適立場的不同，對史料處理的角度當然也有所不同，——（這裏不能深述），因此，不能因鈴木大拙指出胡適「一大堆錯誤」，就認為胡適真的錯了。研究禪史，是要依史料來處理的，「禪宗道（法）統」的「繼承」更應依史料，這是無須懷疑的。時至今日，仍有些禪者以一本禪法為傳承的信物哩

！他們的弟子都是有輩份的啊！

這種以信物為傳承法脈（血脈）的方法，來自於初祖菩提達摩，達摩在生時所說的禪法，其弟子曇林集之成書，其書名就叫「達摩血脈論」。由此可證，禪宗是如何地重視傳承的信物以確定其「血脈」了。

因為有信物為據，神會和尚才敢於單槍匹馬到北方去搶法統。否則，神會憑什麼與普寂相爭呢？普寂是當朝的國師，北方是他的勢力範圍。以他國師的地位，不但有擯斥出家人之權，甚至有生殺大權。神會和尚在他的勢力範圍內如此猖狂，為什麼普寂不發一語呢？它不是怕神會和尚的「單刀直入，直了見性，不言階漸」的教法，因為六祖惠能雖倡頓悟，但也不排除漸修，普寂只要用惠能的漸修語錄就可以將神會擊倒。普寂之所以不發一言，是他手中沒有袈裟的信物。而神會却以「袈裟」現在曹溪為武器，使普寂屈服。由此，也可見信物在禪宗道（法）統繼承過程中，是多麼的重要。

我想再舉一個禪宗的歷史故事，來幫助我們對禪史史料的認知而有所選擇：在禪宗史上，有兩個「神會」和尚。一個當然是六祖惠能弟子並為他爭法統的東京荷澤寺的神會。另一個是成都淨衆寺無相禪師門下的「神會」。那個成都淨衆寺的「神會」和尚，收了一位在禪宗史上頂頂大名的宗密圭峯禪師為弟子，自從南宗東京荷澤寺的「神會」和尚被敕為南宗第七祖以後，南宗的勢力大增，許多禪者攀龍附鳳地說自己是南宗的血脈。宗密也不例外。他竟用移花接木的手法，拋棄了成都淨衆寺的師父「神會」和尚，而認東京荷澤寺的「神會」和尚為師父，而傳南宗禪法。這個故事如以禪法的思想繼承來處理，說宗密是東京荷澤寺的「神會」和尚的兒孫，是可以的。但依禪宗嚴格的法統血脈傳承的方法來處理，那宗密根本就不能算是南宗血脈了。這就是禪學家與禪史家的立場不同，以致觀點也不同的地方。依禪宗的慣例，他們處理血脈的傳承，是採取從嚴的方法，否則，不就天下大亂了嗎？

一 貫道人士的「傳說」應存疑

說明了禪史史料對道（法）統繼承的重要性以後，再來看一貫道人士的「傳說」是否可以信賴。朱先生在文內說：

「一貫道的人士，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：他們的前代祖師，並未自六祖手中承受過那件袈裟，他們的七祖白衣居士白玉蟾，只在六祖惠能圓寂前，受到另一件信物——鉢。……與白玉蟾同時領受這個鉢的，另外還有一位俗家弟子號『道一居士』的馬端陽，大概因此機緣，被一貫道的後學並尊爲七祖，所以一貫道的教史中，有兩位七祖。」

另一說是：在六祖圓寂前；應俗家弟子們恭請，最後一次回到昔日與獵人共處故居，再爲他們說了一次法，臨走不發一語，留鉢而去。此後，這個『聖鉢』，自然成爲一貫道的信體，據說早期的一貫道，在每個私人佛堂中，都供有一個鐵鉢，爲什麼要作此鐵鉢，年代愈久，傳說愈多，也就愈加神秘了。」

由這段文字看來，一貫道人士對自己的「七祖」有幾位，都不能確定，這些位「七祖」如何自六祖惠能處傳承那個鐵鉢，也語焉不詳。這種「傳說」實在難以令人信服，朱先生既然看過「六祖壇經」，並且在「壇經」中摘錄了一些經文以爲立論的依據，那末，我也由「壇經」中錄幾段經文，來證明六祖惠能是否眞眞的將鐵鉢傳給了一貫道的「七祖」們。

一、

「（惠能）一日思惟：『時當弘法，不可久隱。』遂至廣州法性寺，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。時有風吹幡動，一僧曰：『風動？』一僧曰：『幡動！』議論不已。惠能進曰：『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。』一衆駭然，印宗延至上座，徵詰奧義，見惠能言簡理當，不由文字。宗云：『行者定非常人，久聞黃梅衣法南來，莫是行者否？』惠能曰：『不敢。」

』宗於是作禮，告請傳來衣鉢，出示大眾。」（行由品）。由這段經文，可見惠能在十五年的陪獵期間，並未將鉢傳給任何人。

二、

「（寶林）寺殿前，有潭一所，龍常出沒其間，觸擾林木，一日，現形甚巨，波浪汹涌，雲霧陰翳。徒衆皆懼。師叱之曰：『你只能現大身，不能現小身。若爲神龍，當能變化，以小現大；以大現小也。』其龍忽沒，俄頃，忽現小身，躍出潭面。師展鉢試之曰：『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。』龍乃游揚至前，師以鉢白之，龍不能動，師持鉢歸堂上，與龍說法，龍遂化骨而去。」（法海「六祖壇經」序）。

惠能既口稱「老僧」，可見其老年時，鐵鉢仍在他手中，並以之化龍，未曾傳給別人。

三、

「忽有一僧來禮拜，云：『方辯』，是西蜀人。昨於南天竺國見達摩大師，囑方辯速往唐土：『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（註：即袈裟），見傳六代，於韶州曹溪，汝去瞻禮。』方辯遠來，願見我師傳來衣鉢。師乃出示。」（機緣品）

由這，可見在惠能暮年，該鐵鉢仍在其手中，並未傳給別人。

四、

「十一月，廣、韶、新三郡官僚，洎門人僧俗，爭迎眞身，莫決所之。乃焚香禱曰：『香煙指處，師所歸焉。』時，香煙直貫曹溪。十一月十三日，遷神龕，並所傳衣鉢而回。」（付囑品）。

由此可見，在惠能死後，衣、鉢同歸曹溪，並未傳給別人。

五、

「上元元年（西：七六〇）肅宗遣使，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。至永泰元年（西：七六五）五月五日，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。七日，敕刺史楊絳云：『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，却歸曹溪，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。朕謂之國寶，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，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，嚴加守護，勿令遺墜。』後或爲人偷竊，皆不遠而獲，如是者數四……」（付囑品）。

由這，可見惠能死了以後，其衣鉢曾由肅宗請入宮內供養，過了五年未送還。惠能尚且念念不忘，托夢代宗，才勅人頂戴送還。這個鉢並未傳給別人①。

由以上所錄五段經文，足以證明惠能沒有將鐵鉢自其生至死、死後傳給任何人。如果有人說得到了惠能的鉢，除非用「偷竊」的辦法，否則永遠得不到。

我們對史料的認知，無論其爲「經」也好；「律」也好，只要是真實的，都信。不是真實的，就都不信。像上錄的史料，在「壇經」中斑斑可考。若捨之不信，反去相信一貫道士望空信口的「神秘」、「傳說」，我想，任何知識份子或讀書人都不敢認同。

一切的歷史，都是人類經驗的累積和生命的延續。人類靠這累積的歷史經驗而反省、而吸收、而進步，如果對歷史的真偽不分，對真實的歷史不信，這都是令人難以理解的。

禪法的中心思想

禪法（學）的中心思想，是求解脫的「般若」智。五祖弘忍傳六祖惠能的信物之一「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」，就是傳授「般若」智的。凡是「般若」，都談空性，所謂「萬法一相，一相所謂無相，無相即空相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」這幾句話，即是「

般若」的註解。龍樹菩薩在他浩瀚的「大智度論」中，是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提示學者的。

「金剛經」因其是談「般若」空性的經，修空性（註：這個「空」，非第一空、第二空，乃第三空）就要行無念、無相、無住，這種無念、無相、無住的禪法，六祖在其「壇經」中說得很詳細，若以這種禪法去處理禪史，那禪史就變成了纏縛的、多餘的東西了，所以有許多功深的禪行者，不但不留傳記、法語，甚至連姓名都不肯留下來。因爲一切都是妄的，有什麼好談的、好留的。朱先生引用壇經中的無念、無相、無住的禪法來否定禪史的可靠性，那就能使人無話可說，不但不能談，甚至不能動心，因爲動心即妄；起念即乖，到了那如如不動的境界，所謂禪史其可云乎哉？

因此，禪史與禪法有所分別，禪史是談現實世界的事，而禪法是談空性中的事，二者是不可以混爲一談的。

陽明不體佛法深旨

禪的中心思想是般若空性，一個修到無念、無相、無住境界的禪行者，還是要回頭的，故經云：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因爲大乘的禪行者，以救度衆生爲職志，如法藏比丘發四十八大願度衆生，他是不能像小乘行者一樣獨善其身的。

因其是無住生心，所以運水者仍得運水，搬柴者仍得搬柴。對父母仍得孝養，對師長仍得敬奉……不僅如此，還得發願度衆生，具有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」的慈悲心願。雖然入地獄救了衆生，但不着救衆生的功德相。故經云：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當生如是心，我應滅度一切衆生，滅度一切衆生已，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。」這種禪學中心思想，陽明先生是不曾體會到的。朱先生用陽明先生的話說：

「佛氏不着相，其實着了相，吾儒着相，其實不着相。請問？曰：『佛怕父子累，却逃了父子，怕君臣累，却逃了

君臣，怕夫婦累，却逃了夫婦，都是爲君臣、父子、夫婦着了相，便須逃……。」

這是多麼膚淺的看法，孟子不會說：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」嗎？佛是先老人之老，幼人之幼而後老吾之老，幼吾之幼。佛成道以後，救度了無數衆生，然後將未成道前的父王淨飯大王、姨母（生母早死，由姨母養大）、妻子（那輸陀羅）、兒子（羅睺羅）以及滿朝的文武官員都度脫出家而成爲佛僧團中的眷屬。這只是將君臣、父子、夫婦的世俗關係變爲法侶關係而已，佛何會逃了？

陽明那首「無善無惡是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是意之動，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爲善去惡是格物。」的偈子，是由六祖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演化出來的。因爲儒家孔子倡性仁②，孟子倡性善，荀子倡性惡，楊雄倡性善惡混，除佛家倡性無善惡外，儒家沒人會倡性無善惡的，故陽明之性無善惡說，不是他自己的發明而是得自於佛教精義，尤其得自於禪宗。胡適在其「敬與靜」一文中說：「顏李之學，始大聲疾呼地指出：宋儒的主敬，只是佛家打坐的變相。」又在「反玄學」一文中說：「中國近世哲學的遺風，起於北宋，盛於南宋，中興於明朝的中葉……但當日的『反玄學』大革命，簡單說來，不出兩個根本方畧：一是證明先天象數之學是出於道士的，一是證明那明心見性之學，是出於禪宗的，兩者都不是孔家的本色。」所以陽明之學出自於禪而又反禪，這是宋以來各理學家的通病，不足爲怪（紙短，不能深說）。

禪家思想就是求解脫，求生不死。如果每日在君臣、父子、夫婦的圈內糾纏不已，何日才能得其心性的平靜、解脫。一貫道若真是宏揚禪教，而又以禪宗道統之繼承者自居，所行則是陽明的、儒家的那套，表裏不一，其之所以遭人物議者是自取之，非人與之也。宗教長於反省，一貫道無論在教史、教義、教規、教儀等各方面，宜作相當深度的反省，人有人格，教亦有教格，一貫道宜發揮高度的智慧，建立自我的獨特教格，使大眾尊

崇，我這樣忠義的建言，諒不致引以爲忤吧！

我不會與一貫道人士接觸過，更不會參觀、訪問過他們的「壇」、佛堂，宜傳師……因其如此，我的意識內對一貫道原無善、惡的價值判斷，當然也沒有正、邪的分別心理。我只是由朱先生前後兩文內得到一點一貫道的知識。我是一個真、善、美的追求者，一貫道是中國人創立的「宗教」，如果符合真、善、美的標準，自必得到國人及友教的尊敬。但若要以「百貨公司壓倒專賣店」的姿態，使友教的寺廟無人上門，那這起步就錯了。如果一貫道真想繼承禪宗道統，那就一心地依六祖的禪法來宏揚其思想，也依正確的方向蒐集禪史，以肯定自己道統繼承的地位，這樣做，比「神秘」的「傳說」要有效得多。

註釋

① 依僧制，許比丘、比丘尼蓄三物，即鉢、錫杖、三衣，這三件僧用物，是不可離身的，尤其是鉢，依我們湖南話：「那是個吃飯的傢伙。」怎麼可以隨便傳給在家人呢？再說：鉢有着無比神聖的重要性，由佛傳來，出家人視同如佛，故持鉢時都恭恭敬敬地雙手托着，故叫「托鉢」，也不可隨便授與在家人。現在的戒壇，只授給出家人以鉢，在家人即使受苦薩戒，亦不能授以鉢。

② 中庸曰：天命之謂性（釋：天者無不愛也，無不愛者，仁也，故天與性同爲仁）。

論語曰：吾道一以貫之。（釋：一者仁也。）

莊子天地篇曰：愛人利物之謂仁（釋：愛人又利物者唯天、唯性）

鄭玄曰：仁者愛人以及物爲一體。（同右）。

李延平曰：仁者當理而無私心。（釋：天者理也）。

朱子曰：仁者，心之德，天之理，又曰：仁者無私心，合天理之謂。（無須再釋）。

是以，故我說：「孔子倡性仁」。此爲私說，莫知當否，祈教於高明。